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把好用权「方向盘」系好廉洁「安全带」

□ 吕 品

2017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准则》《条例》，把好用权“方向盘”，系好廉洁“安全带”，激浊扬清，扶正祛邪，自觉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履职尽责、作出贡献。

“方向盘”和“安全带”都是汽车上的常见装置，“方向盘”用于控制汽车行驶的方向，“安全带”用于保护驾驶人的行车安全。习近平总书记用“把好用权‘方向盘’，系好廉洁‘安全带’”比喻党员领导干部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生动形象地指明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执政治国的骨干力量，在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管好班子、带好队伍、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

对一名驾驶员而言，上路行驶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明确行驶方向，尤其是行驶在地形复杂的道路上，面对纷繁多变的交通形势，更需要做到始终头脑清醒，明辨方向。对于领导干部也是如此，走好为官从政之路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把好用权“方向盘”。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

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炊事员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哪个方向走。可见，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当前，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有坚定正确立场、坚持正确方向的能力。恰如方向盘如何控制直接影响行车的安全，把稳把好用权方向盘，自己一路顺遂、党和人民的事业行稳致远；方向盘失去控制，则不仅可能危及自身安全，还会酿成事故，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害。领导干部只有深刻认识到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真正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才能选准道路；才能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觉根据党和人民的需要校正方向。

车辆行驶过程中，驾驶员主动规范系好安全带，在发生意外时，安全带就可以避免或减轻驾乘人员所受的伤害。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要时刻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提醒“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时刻系好廉洁“安全带”，把廉洁自律视为走好为官从政之路的底线要求。驾驶员取得驾驶证，只表明具备了国家承认的相应驾驶技能，开车上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仍然要主动系好安全带，谨慎驾驶。领导干部也是如此，走上领导岗位代表着党和人民的信任，同时也是责任的重托。信任代表的是对过去工作实绩和群众基础的认可，但可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也是对不正确行使权力的一种防范和矫正。领导干部只有主动接受监督，自觉筑牢廉洁自律的堤坝，才能永葆人民公仆清廉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把监督当成挑刺儿，或者当成摆设，就听不到真话、看不到真相，有了失误、犯了错误也浑然不知，那是十分危险的。”为保证行车安全，驾驶员要做到每次出行必须系好安全带，决不能因为一两次不系安全带没有出现大问题而心存侥幸。领导干部同样要摒弃侥幸心理，自觉不越雷池一步，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特别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做到慎独慎微，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当然，驾驶员能把好用权、系好安全带，前提是认真学习、正确理解交规和交通规则，了解各种道路标识、信号灯和交通手势的含义，具备正确的安全意识。领导干部也是如此，走好为官从政之路，能够做到把好用权“方向盘”、系好廉洁“安全带”，基础在于认真学习党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重要的党内法规，不仅以身作则增强自己的制度意识、纪律意识、规矩意识，而且要带头认真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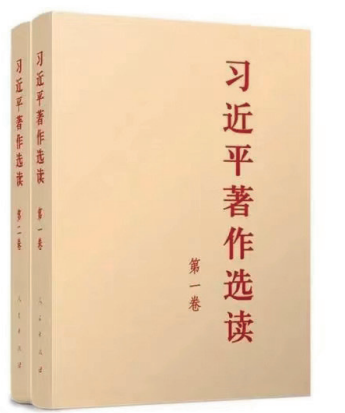
坚持走中国特色治网之道

——读习近平总书记《加快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 薛 睿

习近平著作选读

重读经典



《加快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是2018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这篇重要文献高度概括了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科学回答了事关网络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推动我国网络强国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深刻阐述网信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网信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从信息化发展大势和国内国际大局出发，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事关党的长期执政，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福祉，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把网信工作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来谋划，切实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三个事关”的重要论述凸显了网信工作对于党的执政、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明确了网信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当前，中国正处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尤其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党和国家事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加快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把网信工作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来谋划，深刻体现了党对网信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新高度，是新时代新征程建设网络强国的行动指南。

坚持问题导向，继续深入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网络强国建设面临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尤其聚焦我国在互联网创新能力、关键核心技术、信息资源共享、企业产业实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网络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原则要求和基本方法。

明确网络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技术要强、内容要强、基础要强、人才要强、国际话语权要强的要求，向着网络基础设施普遍普及、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数字经济全面发展、网络安全保

障有力、网络攻防实力均衡的方向不断前进，最终达到技术先进、产业发达、攻防兼备、制网权尽在掌握、网络安全坚不可摧的目标。”从技术、内容、基础、人才、国际话语权等多个方面科学阐述了网络强国的战略要求，直面回应了我国在网络强国建设面临的问题。

明确网络强国建设的原则要求。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网络强国建设的五点原则：一是创新发展原则。强调信息化发展的引领作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二是依法治理原则。法治原则是实现网络强国建设的制度保障与长效机制，要坚持依法治网，让互联网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三是保障安全原则。坚持正确网络安全观，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以网络安全构建助推国家安全屏障建设。四是兴利除弊原则。坚持防范风险和促进健康发展并重，把握机遇挑战，推动互联网更好造福社会。五是造福人民原则。习近平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造福人民原则充分体现了网络强国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目的和归宿。网络强国建设的五点原则充分体现了党领导网络建设的先进性与中国共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进一步推动网络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明确网络强国建设的基本方法。这篇重要文献对未来做好网信工作的基本方法进行了具体部署。一是重视网信工作的系统性。网络强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习近平书记指出：“网信工作涉及众多领域，要加强统筹协调、实施综合治理，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这是系统思维在网络强国建设中的具体运用。二是重视网信工作的辩证性。这篇重要文献提出了做好

网信工作的四组辩证关系，强调“要把握好安全和发展、自由和秩序、开放和自主、管理和服务的辩证关系”，是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方法论。三是重视网信工作的整体性。“整体推进网络内容建设、网络安全、信息化、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等各项工作”。明确新形势下加强网信工作的关键点和着力点，为网信事业长远发展进行全面布局。

凸显世界意义，为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互联网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因此，互联网治理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内层面。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尤其是美西方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渗透霸凌行径，要在基于保障网络主权的基础上，构筑良好的全球互联网秩序，这对促进全球互联网共同繁荣发展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主动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敏锐把握国际互联网发展趋势，提出要坚持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等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四项原则”，还提出了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保障网络安全、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等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擘画了网络空间建设的美好愿景。倡导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携手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为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彰显大国担当。



舍己之田耘人之田

——语言学家罗常培的治学之道

□ 彭馨蓓 张小倩

罗常培一生致力于发展我国的语言学，在音韵学、实验语音学、汉语方言学、民族语言调查、社会语言学等领域都作出开创性贡献，“新华字典之父”魏建功评价罗常培：“他称得上是中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是继往开来出力最多的人。”

“要求自己加倍努力”

在给青年人分享治学经验的一次讲话中，罗常培说：“我心里常有几个字，就是‘在缺陷中努力’。我总是感到知识不够，不如别人，因此要求自己加倍努力。”

罗常培出生于一个没落的满族家庭，自幼勤奋好学，早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学术报国的宏伟志向。七七事变爆发后，罗常培曾这样说过：“我既不能立刻投笔从戎，效命疆场；也没机会杀身成仁，以死报国，那么，与其成天的愁因对泣，一筹莫展，何如努力从事自己未完成的工作，藉以镇压激昂慷慨的悲怀？假如能在危城中奋勉写成几本书……自觉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学校，对得起国家！”

在语言学研究的过程中，罗常培通过不断深挖资料，对音韵史上的重要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他的著作《唐五代西北方音》是研究古方言领域里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一次偶然的机缘，罗常培见到了日本学者羽

田亨搜集的《敦煌遗书》中的《藏汉对译千字文》，其中包含了唐五代汉藏对音和藏文译音的材料，非常珍贵。在向朋友借阅这本书后，罗常培把每个字都抄在卡片上，后又去寻求陈寅恪的指导，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才最终完成他的著作。《唐五代西北方音》把族际材料、切韵系统、现代方言紧密科学地结合起来，成功地构拟出一大片区域的古方言语音系统。其严谨的研究程序以及对大量资料的掌握和扎实研究，令人信服。

抗战期间，罗常培随同北京大学辗转迁移到昆明，尽管“交通梗阻，生活高涨，经费拮据，印刷困难”，他仍不辞长途跋涉进行调查，克服重重困难，在七八年间完成了汉语研究、侗台语研究、藏缅语研究和民家语研究四个纲中的三十九个目的工作。其中如《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莲山摆摆语文初探》等，都是由他亲自编写的。罗常培与赵元任、李方桂被誉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他对少数民族的语言特点和语音体系的深入研究，为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的语言教学和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并且经由这些调查，培养了一大批民族语言研究专家，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大规模民族语言调查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罗常培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身新中国语言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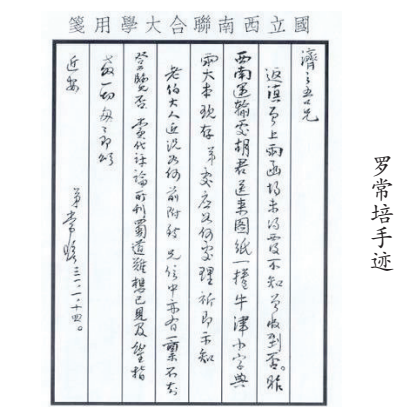
业的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首任所长，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汉语规范化问题、民族语言研究等事业鞠躬尽瘁。据罗常培女儿罗慎仪回忆：“在解放后，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在政府的组织和支持下，语文研究工作者才有了‘用武之地’，所以父亲越干越起劲，直到最后一次住医院前，双脚已肿得穿不上鞋，还在认真整理文稿，希望后人更容易接替他，进一步发展语言学事业。”

对于培养青年“百分之百地坦率亲切”

20世纪40年代，罗常培在美国讲学时，曾给他的学生们创办的刊物写过一篇《舍己耘人》的文章，文章中提到做老师的应当有“舍己之田耘人之田”的精神，来帮助学生们做好学术研究的工作。

冰心夫妇是罗常培的挚友。在冰心对罗常培的一篇纪念文中就提到，罗常培对“学生们在治学和生活上的那种无微不至的诱掖和关怀，是我所亲眼看到又是文藻所最为敬佩和赞赏的”。语言学家袁家骅曾说，罗常培“对于培养青年，鼓励后进，那是百分之百地坦率亲切，肯呕心沥血地加以指点的”。

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行人沃克曾是罗常培在美国访学时的学生，他



罗常培手迹

在纪念罗常培的文章中也特别提到了罗常培作为一名老师对学生产生的影响：“特别令人怀念的是，作为一位大师，把他伟大的祖国，中国社会的成就和特点教给他国的青年学生。特别是以他自己的楷模说明一个人可以在一生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才智，并以这样的榜样教育其他人更友爱、谦虚，更有造诣，更有道德，更诚实，更宽厚，更平易近人。”

罗常培对学生和后学的帮助被传为美谈，但他对同辈的帮助却鲜有人知。罗常培的挚友历史学家郑天挺就把自己的学术成就归功于罗常培真挚的鼓励和切实的帮助：“我不喜写文章，更不愿写成后发表，罗先生不断加以劝勉，说服了我。我能在学术上稍稍有所表现，是由罗先生鼓励开始

的……许多书籍是罗先生借阅的，许多疑难是罗先生代为分析解决的。”

用“兼蓄并包”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

罗常培自己回忆道，早在求学时期，他就深受蔡元培“兼蓄并包”思想的影响，“对于当时的出版品，只要是‘新’的，不问它属于那党那派的，都本着蔡先生‘兼蓄并包’的态度尽量搜集”。罗常培对其他各个学科的丰富涉猎也是他获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他早期的研究中，跨学科的涉猎早已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语言学研究与社会文化的研究基本是脱离的，直到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发表，这部著作被誉为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先驱”和“开山之作”。该书用大量语言事实，论证语言与人类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关系。其中一篇长文《论藏民族的父子连名制》来源于20世纪40年代他在云南的调查。结合当地的语言事实，罗常培注意搜集有“父子连名制”这一民族文化特征的材料，当时连大理荒郊野外的墓碑他都特意去查看。这篇语言学文章也解决了两个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问题，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罗常培对跨学科的重视也促成了

新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发展。他认为，汉语语音的一个难点是声调，声调的研究必须有合适的设备来测量，于是招揽了一些具有物理学背景的人才。在他的带领下，语言研究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语音学科工作者，自主研发了许多实验语音学的重要设备，为新中国的语音学事业建设贡献了很大力量。

罗常培作为语言研究所首任所长，制定了语言研究所的三项总体规划：第一项，开展全国性的汉语方言普查；第二项，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第三项，编写规范的现代汉语语法。这些工作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事业有着深远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比较艰难的年代，罗常培高瞻远瞩、全面布局，积极支持年轻学者出国访学，并将学习成果应用到祖国的建设当中，为提高中国语言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及语言学的应用价值贡献了积极的力量。同时，在学术上，罗常培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鼓励语言研究所的青年学者学好外语，用跨语言、跨学科的眼光研究汉语，对语言学乃至人文社科的研究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